

前两天笔者去看了电影《大鱼海棠》，不得不说观影感觉极差，以至于电影看到一半，就有人因受不了而退场，邻座那位小哥拉着他女朋友退场时愤然留下一句话：“实在受不了女主角这种圣母婊。”

圣母婊，按百度百科的解释，指看似富有爱心、实则以爱的名义罔顾客观事实、不讲原则，甚至不惜为此道德绑架乃至伤害无辜者的人。这个词的最初起源是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小说《三体3·死神永生》中塑造的人物程心，在书中，身为主人公的程心以爱和人类普世价值为逻辑起点一次次做出错误的抉择，最终把全人类推向了毁灭。由于小说一再强调程心的“圣母情结”，而刘慈欣在小说开头又十分不厚道地讲了一个妓女妄图成为圣女解救君士坦丁之围的故事。将两个故事结合起来，“圣母婊”的名号就叫开了。

时至今日，“圣母婊”一词在中国的应用已经到了蔚为壮观的地步，在青年们的话语系统中，这个词几乎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又极具杀伤力——挤公交时，那些指责他人不给老幼孕残让座而自己却“稳坐钓鱼台”的人是“圣母婊”；网络论战中，那些指责他人吃狗肉残忍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也是“圣母婊”；更有甚者，这个评价还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久前欧洲闹难民危机，中国网友对于欧洲人先是敞开国门接纳难民，而后被难民所带来问题闹得焦头烂额的评价也高度凝结为三个字：“圣母婊”。

对“圣母婊”的极度反感，几乎是当下中国崛起最为迅速的一大文化现象。如今在微信上崛起的不少自媒体，如咪蒙和papi酱，最早起家时都是

【文化论坛】

## 『圣母情结』为何遭人烦

□王昱



靠着黑“圣母婊”的段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近上映的《大鱼海棠》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就是它没有感知到这种思潮，选择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讲述一个主人公为爱不惜毁灭

整个世界的故事。当然，作为一部酝酿创作12年的电影，编剧当年写剧本时不可能预见到如今的受众们会如此反感这类故事。这导致了《大鱼海棠》脚本在当年也许是个无可厚非的故事，放到今天却注定要被骂成狗，真是造化弄人。

在对“圣母婊”神烦的背后，民众中正在悄悄酝酿的其实是一种极度的“反道德主义”。这种思潮在中国产生看似有些匪夷所思，如今痛骂“圣母婊”的八零后、九零后们，当年受的很可能是同时代全世界最严苛的道德教育，我们从入学后动不动就被组织着给灾区捐款、上街义务打扫卫生，会写作文之后被逼着写“日行一善”的日记，班级里如果谁做了什么“损害集体荣誉”的事情，班主任就得搞个全班连坐式的思想教育班会，但也许正是这些被强制灌输的道德教育，让我们在长大后对带有绑架性质的道德说教和“我替你做主”式的爱的付出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对于童年所受道德说教的逆反，造就了我们长大后对“圣母婊”的愤恨。

往深里说，“圣母婊”所代表的价值观，正如其“圣母”一词的来源一般起源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至于有些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其实就反感“圣母婊”所代表的那套“爱无等差”的理论。孔子如果复活在当下，估计也是十分讨厌“圣母婊”的主儿，他说“乡愿，德之贼也”，这显然是反对道德绑架。至于“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则简直是冲着《圣经》中“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右脸，把左脸伸过去也由他打”这类说教去的。道德这玩意儿，在古代中国从没有像西方那般被拔高到神学的高度，而从来就是一种很世俗、很功利性的东西，儿

子对父母尽孝是为了报养育之恩，臣子对君王尽忠是为了报知遇之恩。在中国人的道德体系中，西方基督教圣母式的那种普世之爱、无私之爱，甚至是情人之间的那种浪漫之爱在我国从来没有生存的土壤。在这片土地上，所有感情的付出都要掂量一下对方回报的分量，才能被评价为是否“对”。如果“对不起”，则是天大的事儿，顿时父子恩断、兄弟义绝，亲朋之间翻脸比翻书还快。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次“治乱循环”其实就是整个社会“道德交易”谈崩了之后的必然结果。

近代中国接受西方那套带有“圣母”气质的道德体系其实是个历史的偶然，主要原因是咱打不过人家才被迫跟人家学。而一学起来，就发现我们那一套交易式道德只能维持家庭中的私德，至于构建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公德，则没西方的那一套不行。于是什么“人人生而平等”、“生命价值高于一切”、“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都跟着来了。倒回鲁迅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你会发现他们那一代人都在为“医治国人精神”而努力，说白了其实就是要把中国人那种功利计算式的道德观改过来。

明白了我们当年为啥要引进“圣母”，当下国人为何讨厌“圣母婊”也就容易理解了。我们从心底里其实从没理解和赞同“西方那一套”，近代只是觉得它好用，才搞了个拿来主义。如今中国发展很好，反而是西方束缚住了自己手脚。于是从还有没用过的“圣母”变成了没用的“圣母婊”，自然愈发遭国人讨厌。中国人神烦“圣母婊”的风气就这么形成了，至于这风气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也许只能留待时间去验证。

【有点意思】

## 咪蒙的

## “麻沸散”和“枪药”

□俞耕耘

当自媒体发展已成无意识的“群策群力”，事实上，大多自媒体作者并不比卖笑者高级许多，他们一直在心焦地等待买笑者。这么说可能犯了众怒，但您还别不乐意。扪心自问，你写公号文章是否因为看到网红“发达”急了眼？是否又为涨粉吸金苦无怪招？没几个人会认为一本正经，展示深度，标示什么品位、情调、情怀就能吸引受众，写出十万加、百万加的文章。因为这个地儿，没人要你启蒙（教授请去高校发论文），没人听你说教（成功学请去培训机构听演讲），没人看你感悟（你谁啊？没人听你私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网红作者是怎么炼成的？答曰：他们有绝活啊！比如，当我们对“鸡汤”普遍反胃时，咪蒙早已换代，施展了她的“麻沸散”加“枪药”的绝活。对于网上总结咪蒙的“毒鸡汤”风味，我觉得并不准确。这里有必要重谈鸡汤的属性：首先，它说开花儿，也还是水嘛；其次，它再咋变，也是“稀餐”变不出鸡肉（硬货）。这正如推销给老年人的保健品，吃不死人，治不了病，心理暗示你有营养，最终瞎耽误工夫。那么，所谓“毒鸡汤”就像是“饮鸩止渴”的写法，让你必须把“受滋补”和“被手撕”同时搅和，欲仙欲死。咪蒙显然不是，她是先麻醉你，再一枪崩了你的风格。这无疑传统鸡汤的“高配增强版”。

鸡汤就像抗生素，读者的免疫性反感只会越来越强。如果你不懂一点儿群体心理学的皮毛，想当网红作者，这辈子你是没戏了。话说手撕、毒舌，本不是啥稀奇特色，金姐（金星）不就向来以手撕明星占据了“半壁江山”嘛。咪蒙以《致贱人》等系列“名文”、经典骂战奠定了江湖地位。要知道，正面文章的微风细雨总不如情绪宣泄的狂欢带感，煽动读者去憎恶、反抗总是比劝导读者接受事物容易得多。在点击量上，吸引大众的从来就不是理智和观点，而是情绪和姿态。当我们从小看多了教科书“各打五十大板”的废话逻辑，不免从心底里渴望极端哪怕是片面的坚定视角。

咪蒙的狡黠在于她的“麻沸散”：总是站在和大众最相似的立场，假想敌又并非明确的个人，论述却都是价值立场上的无解话题。换句话说，她用偏激的方式（粗口的戾气）表述了最不偏激的观点，引起的却是大众的附和。相比而言，戴立忍事件中的赵薇简直就像咪蒙的“反命题”，始终没有搞清受众的愤怒点在哪里。其次，骂战在本质上是谁主动谁占优势的活动，这就跟打人者为何手不疼、被打者为何脸疼是同样的逻辑。你很难发现回骂咪蒙者会有什么优势，因为他们不过是对咪蒙的机械反应，成为一个简单幼稚的“学话者”。

然而，骂战吸粉又不仅仅是简单迎合受众话语的暴力狂欢。骂战就像借书，有来有往，中国人爱看的就是过招的“回合”。咪蒙或许看到骂战背后的秘密，那就是：没有任何手段比它更吸引粉丝。因为无论你站在哪一方，都要关注，才能知道下文如何。不过，大多粉丝都忘了咪蒙的枪药装上后就成了“霰弹”，四面八方，你也难免中枪。但是，你却没有“被害”的感觉，为何？因为人家的“麻沸散”下得好啊，可以镇痛：能把不同的人群催眠成同一种情绪、同一种渴望快感的傻样。它让我们反思，在科技如此迅猛发展、大众思想理应更加多元的今天，骂战却让我们的观点出其不意地整合起来，变为两极对抗的单调。在我看来，这是因为骂战潜藏了人类施虐与受虐的双重欲望，无论是骂人者和被骂者都能各取所需，找到快感。

【热点冷议】

## 朋友圈替你掐了名人没掐的架，

□魏新丽

近期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也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事情。比如，赵薇把仇人的名字赐给粉丝女儿用来镇魂；龙应台被于丹的演讲给气晕了……这些网络爆款事件在被群众广泛转发后，最后都被澄清只不过是段子和伪造。从常识上来看，这些事件也是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但网友们接受起来却毫不困难。联想到之前杨绛先生去世后，朋友圈里也有各种山寨的“杨绛牌”心灵鸡汤，这不得不让人对公共言论的理性产生怀疑和担忧。

群体对非理性言论的迷信和追捧，在古今中外其实都是一种“传统”。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中描述了一场发生在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正是一场公共空间内的谣言大传播。1768年春，不知是从何人口中传出的一个无稽之谈，称有术士割取人们的头发、收集人们的衣物，然后通过作法偷取受害者的精气，使之发病甚至死去。这种传言并无证据，却得到了广泛认可。谣言传遍大半个中国，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无人不陷入叫魂妖术的恐慌中。极端之处，民众见到和尚就要抓去见官，官员们也得煞有介事地审问。

对于妖术的恐慌显然是一种群体的盲从，而这种盲从有着古老的心理机制。早

在19世纪末，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狂潮的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就已经对群体的无意识进行了鲜明的批判。他将群体看做“乌合之众”，认为他们有着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冲动、急躁、缺少理智，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情感，易受暗示和轻信等等。

虽已经到了21世纪，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变，但是群体的心态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勒庞的判断依然准确。在公共舆论空间中，越是简单粗暴的谣言越是有市场。这些谣言虽然缺乏逻辑、缺少常识，却有

着“夸张”的共同点，特别能戳中群体感情的痛点或兴奋点。在热点事件中，这些谣言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民众的激烈情绪，或恐慌，或兴奋，或愤怒等等。这些情绪聚少成多、相互传染，形成难以抵挡的情绪狂潮，有时甚至会酿成网络暴力事件。

勒庞认为群体只会被极端情感所打动。“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无论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其简单而夸张。”不过，越简单越危险，因为这其中可能埋藏着陷阱：有时是对事实无意的扭曲，有时是别有用心之人的刻意歪曲。但对大多数民众来说，他们会不加分辨地接收这些夸张的感情，同时输出更为强烈的感情，“暗示和相互传染的煽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马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勒庞说。因此，最近那些看似匪夷所思的事件，却成了众多民众的共识。这些捏造的谎言被群众盖上了“事实”的红印章，得到广泛传播。这正应了勒庞的判断：“在群体中间，不可能存在不可能的事。”

比如说近期的龙应台批于丹事件，其实这篇《于丹，你演讲能否不再胡扯》来自于2011年的一篇旧文，作者是杨恒均。经过别有用心之人的移花接木，这篇文章迅速风靡朋友圈。没人思考事件的可信性，更不会考据一下文章的出处。

不是所有夸张的情感都

会被接受，集体的幻觉也有选择性，人们乐于接受他们乐于接受的东西。而别有用心之人正是找准了群体的兴奋点，稍加暗示和指引，就能将群体引入歧途。龙应台批于丹事件，正迎合了民众头脑中的幻想。于丹的不少言论存在争议，而龙应台又是敢于直言的，因此，龙应台批于丹很能拨动人们的神经。很多人见到题目就已经热血上涌，先转为敬。

一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中，他就很容易被集体无意识所裹挟，变得盲目和非理性，并且个人难以察觉。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写道：“常识及作为趋同工具的公共舆论之类的匿名权威又取代了良心权威。我们变成了机器人，生活在个人自决的幻觉中。”在这种幻觉下，人们自以为他对事情有着全面的了解，所做的决定也出自本心，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遵循他人和集体的希望。

集体的幻觉带来狂热和非理性，最终可能会酿成不幸的后果。近期的英国脱欧公投就是一个例子，很多人在结果出来后立马就后悔了。虽然集体无意识格外强大，但是网络上的客观理性声音也并非没有，只是它们往往被淹没在高涨的非理性情绪之中了。要寻找公共言论的理性，或许陈寅恪的十字箴言可供借鉴，所谓“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